

# 马克思劳动异化视角下人工智能异化的表征及扬弃

郑佳岭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四川德阳, 618000)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深入改变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力量, 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引发了诸多异化问题。当前, 智能产品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劳动者沦为算法和技术的附庸、人的主体性被技术隐蔽消解等现象, 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形成呼应。充分挖掘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时代价值, 揭示资本逻辑支配下人工智能技术异化的内在本质, 复归人的主体性, 助力实现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协同共进。

**关键词:** 劳动异化; 人工智能; 扬弃路径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er.v2i3.1465>

当前,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高速迭代、全域普及, 已成为驱动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加强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融合”“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为我国人工智能良性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人工智能在提升生产效率、便利社会生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亦呈现鲜明的双面性。在资本逐利逻辑与技术工具理性的交织作用下, 技术滥用、算法管控、结构性失业、人际疏离等问题日益凸显, 人工智能逐步演变为支配劳动者、消解人的主体性的异己力量。对此, 亟须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这一视角出发, 剖析人工智能异化的现实表征, 探寻异化扬弃的实践路径, 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安全、可控、可靠。

## 一、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中体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绝对精神异化”的唯心主义立场和费尔巴哈“自然界的人异化”的人本主义局限, 将“异化”从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变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科学工具, 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异化的本质, 主要包含四个核心维度。

---

**作者简介:** 郑佳岭 (1997-), 女, 助教,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 E-mail: zhengjialing@tfsfwufe.edu.cn。

**基金项目:** 无。

其一，劳动产品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sup>[1]</sup>劳动产品作为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其本真意义在于确证与彰显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产品转化为商品被资本家占有，最终成为剥削、压迫劳动者的物质力量，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对立。

其二，劳动过程异化。劳动本应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确证自身存在、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途径。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sup>[2]</sup>劳动成为劳动者强制性的谋生工具。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丧失了主动性和创造性，沦为劳动的附属品。劳动者在这种劳动中感到不是幸福而是痛苦，一旦有机会就会逃避这种劳动。

其三，劳动者类本质异化。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产品异化使劳动者失去了自身对象化的产物，劳动过程异化使劳动者沦为劳动的附属品，最终导致劳动者的类本质异化。劳动由人的内在需要变成外在的强制，从人的本质活动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人的主体性被消解，失去了劳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与动物的本能活动趋同。

其四，劳动关系异化。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正常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之间本应是平等协作、互利共生的关系。但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与占有劳动产品的资本家形成对立关系，同时劳动者之间因生存压力而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劳动不再成为人与人之间联结的纽带，反而变成阶级剥削的媒介，造成人与人的对立分化。

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核心在于，深刻揭示了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扬弃异化的实践路径是消除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理论不仅是解读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钥匙，也为我们剖析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异化问题提供了学理支撑和分析范式。

## 二、人工智能异化的现实表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传统的劳动方式、劳动过程、劳动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革。劳动异化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呈现出来，其现实表征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本质仍是资本逻辑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的进一步扩张和深化。

### （一）劳动产品异化：智能产品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

智能产品的更新与迭代升级本应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解放人的双手、提高生活质量而存在，但在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下，智能产品异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在资本主导的生产体系下，智能产品的生产资料与最终所有权被资本垄断，产品设计者仅拥有劳动过程的部分参与权和使用权，并不具备所有权和支配权，由此形成异化悖论：智能产品设计者创造出的产品越完美、应用越广泛，智能产品就越背离产品设计者，并可能成为与其相对立的力量。<sup>[3]</sup>同时资本通过智能产品实现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双重剥削：生产领域借助智能化机器的高效性，推行“无人化”工厂，让人沦为劳动过程的“旁观者”；消费领域借助算法制造“技术沉溺”和“信息茧房”，消解人的主体性与认知的多样性，使人工智能成为支配人类的异己力量，与人的本质需求和自由全面发展相背离。

### （二）劳动过程异化：劳动者沦为算法和技术的附庸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获得生活的满足感与愉悦感。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没有消解异化劳动给人带来的不幸，而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让劳动者成为算法和技术的附庸。智能化时代的劳动分工被进一步细化，劳动者的工作被简化为简单的操作、监控与维护，劳动者必须服从算法指令和技术规则，自由自觉地活动变成被动性、重复性的机械操作，劳动过程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被极大削弱。比如，在现代服务业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劳动全程被算法调度与监控，派单、路线、薪

酬、奖惩全由算法决定，劳动者沦为被算法和技术捆绑的附庸。这样的劳动过程不再是人的自身价值的展现，反而成为一种外在的、令人压抑的负担，劳动的价值感与趣味性被消解，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相去甚远。

### （三）劳动者类本质异化：人的主体性被技术隐蔽消解

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类本质的异化，集中体现为思维能力弱化与实践能力退化，核心是人的类本质被技术隐蔽消解。马克思指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sup>[4]</sup>，人的需要本应是丰富多元的。但算法推荐的同质化，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将人的认知封闭在狭窄范围内。久而久之，人的多样化需求被限制，逐渐丧失否定、批判与超越的能力，思想认知趋于单一片面，沦为“单向度的人”。同时，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sup>[5]</sup>人工智能的全方位自动化应用，不仅大量替代低技能劳动岗位，使劳动者被排挤出生产过程，从生产主导者沦为“旁观者”；更使人长期脱离劳动实践，劳动技能逐渐退化，丧失自由自觉劳动的机会，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被隐蔽消解。

### （四）人与人的关系异化：劳动关系的数字化重构与对立

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使人与人的关系异化呈现出数字化、隐蔽化的全新特征，既深刻改变了日常交往形态，也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颠覆性重构。算法透明化使个体沦为“透明人”，个人信息与行为数据被全面捕捉并商品化，人失去对自身隐私的控制权，为规避风险不得不选择自我封闭。同时，人工智能构建的虚拟世界极大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却也导致人们过度沉溺，虚拟交往逐渐替代现实交往，虚拟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割裂加剧了人际隔阂。此外，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高端劳动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地位差距持续扩大，加大了贫富差距；资本借助算法实现对劳动的精准控制与剥削，进一步激化了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双方的对立。

## 三、人工智能异化的扬弃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产品的广泛应用，使人逐渐异化为“非人”，其根本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扬弃人工智能异化不能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需从根本上变革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通过破除资本逻辑桎梏、强化上层建筑引领、重塑人的主体性三个维度协同发力，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 （一）破除资本逻辑桎梏：夯实人工智能良性发展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认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sup>[6]</sup>资本逻辑的逐利性是人工智能异化的根源，因而破除资本逻辑桎梏、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良性引导作用是扬弃异化的关键。社会主义公有制确保了人工智能生产资料的社会属性，使其真正成为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谋发展的利器。一方面，公有制能保证人工智能创造的巨大财富归全体人民共享，国家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被机器替代的劳动者提供过渡性支持，同时加强技能培训实现全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公有制下的分配制度能实现财富的公平合理分配，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健全与人工智能时代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缩小收入差距，避免技术成为加剧两极分化的“加速器”。不仅如此，公有制下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催生的新型市场主体，不再将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追求，而是始终秉持“以人为本、共享惠民、融合发展、科研创新”的核心价值理念，自觉承担起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责任，从而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 （二）强化上层建筑引领：构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

强化上层建筑引领、完善制度与伦理治理体系，是消解人工智能异化风险、保障技术健康有序发展

的制度保障。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新兴技术，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便利了群众生产生活。但其发展尚未完全成熟，技术迭代迅速、应用场景广泛，对现行法律规范与社会治理体系构成新挑战，衍生出诸多技术风险与社会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sup>[1]</sup>这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消解人工智能异化问题，需要从法治建设、多元监管与伦理规制协同发力。法治建设上，立足我国弱人工智能发展实际，采取渐进式立法思路，聚焦自动驾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重点应用领域，依托现有法律体系补齐制度短板，强化个人数据与隐私安全规制，严厉整治信息泄露、非法采集等乱象。同时坚持规范与激励并重，依托专业智库优化立法设计，在防控风险的同时保障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监管治理上，突破单一行政监管模式，构建政府、企业、学界、公众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压实各方责任，形成全方位、全流程监管合力。与此同时，持续完善人工智能科技伦理体系，确立以人为本、技术向善的核心原则，健全全过程问责机制，普及科技伦理教育，规范从业者价值导向，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向善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三）重塑人的主体性：实现劳动者与人工智能的协同发展

重塑人的主体性是扬弃人工智能异化的根本落脚点，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让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机良性协同。在生产领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技术研发，强化从业者的责任意识与伦理自觉，同时构建跨领域内外结合的监督体系，从源头防范算法歧视、技术滥用等风险。在应用领域，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人工智能科普与风险教育，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与风险防控意识，摒弃被动适配技术的思维，树立自主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主动掌控劳动节奏与劳动过程，重新唤醒劳动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摆脱技术附庸的被动状态。同时，引导劳动者主动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与专业技能，持续提升综合素质，适配智能化时代岗位的多元化要求，破除技术迭代可能带来的失业困境。此外，发挥人工智能解放劳动的积极作用，劳动者要摆脱算法控制，培养多元化兴趣与批判性思维，打破“单向度”的发展困境，进而在劳动实践中不断确证自身价值、实现自我超越，最终形成人推动技术进步、技术服务人的良性循环发展。

综上，人工智能作为新时代的新型生产力，正在深刻变革生产生活方式，赋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社会发展。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人工智能异化是技术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不能因其负面效应否定技术的时代价值，也不能放任异化问题持续蔓延。基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审视人工智能的新型劳动异化问题，剖析其现实表征，并探索科学有效的扬弃路径，能够提前防范技术发展风险、消解资本逻辑带来的技术异化弊端。唯有坚守人的主体地位、规范技术与资本发展边界，才能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良性发展，使其始终服务于社会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
- [3] 闫坤如.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及其本质探源[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49(3): 100-

107.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11.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495.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66.
- [7] 吴海波.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自立自强 突出应用导向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EB/OL]. 央广网, (2025-04-26)[2026-05-23]. [https://news.cnr.cn/native/gd/sz/20250426/t20250426\\_527149162.shtml](https://news.cnr.cn/native/gd/sz/20250426/t20250426_527149162.shtml)